

郑州日报

2011年4月14日 星期四

精品文摘

第229期

编辑 李昆霞 校对 屠会新
电话 67655539
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13
ZHENGZHOU DAILY SPECIAL COLLECTION

感动,有没有用?

白岩松

《感动中国》对于每个普通的观众来说,可能意味着无法被擦干的泪水,或者是,心灵的一次净化。

这感动,与我们寻找中的信仰有关系吗?我们,还会感动多久?感动,有用吗?

2003年2月14日,第一届《感动中国》在央视播出。这一届的《感动中国》,在录制的时候,颁奖过程中穿插了几个文艺节目。

顺利录制完毕,然而赵化勇会长在审完片之后,作了一个决定,将颁奖礼中所有的文艺因素拿掉,朴素一些,单纯一些。事后证明,这是一个正确且关键的决定,人们需要的,正是最朴素的感动。

节目播出的当天,我就接到很多短信,都是表达感动。

节目播出的第二天晚上,我去人民大会堂,贾庆林看到我,最先表达了对《感动中国》的称赞,他说:“昨天的节目我看了,真感人!”隔了一会儿,我又看到吴仪和周永康,他们向我表达了对《感动中国》的喜爱之情,语言也都非常朴素:“太感人了!”

几乎在最短的时间,《感动中国》似乎获得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,这也就意味着,《感动中国》触碰到了时代的敏感点,满足了大家心中有,可周围笔下无的内在需求。

到现在为止的八年,《感动中国》的制作过程,应当是一个另类的模板。

领导往往不以领导的身份介入制作,但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投入。按理说,当时的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,每年看完节目把个关表个态就可以,可这位多年唐诗宋词朗诵会的幕

后操盘手,对文字与声音的表达绝对内行并“发烧”。有一次,为《感动中国》颁奖词的朗读问题,给我打了40分钟的电话,之后也多次与我交流,这时候,他绝对不是什么副部长,而是一个文人,一个被《感动中国》打动的老大哥。

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罗明,是《感动中国》的出品人和把关人,很多《感动中国》的颁奖词及四个字的定评之词,都是出自他的笔下。

制片人朱波手机的铃声,长年是《感动中国》的歌曲旋律,虽然他还负责其他一些大型年度制作,但显然,他让自己时刻处于“感动”状态中。

导演樊馨蔓,每年都能用她信奉的超自然力量把合作者累趴下。这美女导演一年似乎就干《感动中国》这一件事,头半年反思,后半年思考,其余时间,是编片子时夸所有的合作者并陪被采访者哭。

做《感动中国》的主持人,是一件既幸福又痛苦的事情。幸福在于,你可以离感动如此之近;而痛苦在于,当你被感动时,你必须克制,不能放纵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滑落。

有一次,现场录制时,屏幕上在放片子,一名解放军军官,陪来部队探亲的妻子女儿周末上街,看见一位轻生者落水,他下水救人。轻生者获救了,而他,却在妻子的注视下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他的三四岁的小女儿,在人群中拿着爸爸脱下的旅游鞋边哭边喊:“爸爸回家,爸爸回家……”

我是一个父亲,这个画面我之前也看过,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依然没能忍住,泪水夺眶而出并难以控制,然而又必须控制,因为两分钟之后,是我的主持段落。于是,让同事拿来



相信未来,老有所依

陈敏

谁都不会永远年轻,都会迎来人生的落幕——夕阳落下后是璀璨的星空还是无边的黑暗,都在于今日的建设和理想。

民政部及中国老龄委的数据显示,中国城市老年家庭的空巢率已增至49.7%。这意味着,100个城市家庭中,就有近50个家庭的老人守着孤灯,盼望亲人“常回家看看”。

孤独啃噬生命。经济发展,城市化大潮带来了人口流动,年轻人或出国,或打工,而老人们据守原地,情感缺失,只能想尽办法“抵抗孤独”。

“我88岁征婚,要求不高,就想和对方通个电话,说说话。”“我每天都在楼下的公交站等车,坐上整整一圈再回来,感受一下人气。”……

独生子女政策下的“4-2-1”小型家庭(即一对年轻夫妇要照顾4位老人和一个小孩),使“80后”一代力所不及,也导致空巢老人激增。

从北京等大城市到小村落,齐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曾向无数中国国家庭询问这个问题。源自“爱”的,北京市有61.8%,农村只有20.5%。很多农村孩子的诞生是为了满足“养儿防老”和“传宗接代”的需求。陈教授认为,金融服务水平在中国城乡发展很不均衡,当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时,老百姓没有办法浪费,只有“养儿防老”。

改变无法避免,中国传统的“居家式养老”富含亲情味,却因“空巢”时代而变成“无情可依”。儒家文化提倡“孝道”。不孝子女常有,也都是父母含辛茹苦养大的。

如今,“居家式养老”功能日益

子中间,发现有几个比昨天要给他擦鞋的孩子更机灵,似乎也更适合当这个电影的男主角。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让这个孩子来试试,因为他觉得他是个善良的人,而电影中的孩子,正是一个善良的人。

后来的故事就简单了,这部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,一个在车站擦皮鞋的孩子,就此走上了“星光大道”,成为巴西家喻户晓的明星文尼西斯。说句题外话,在巴西,最幸运的擦鞋匠并不是文尼西斯,而是另一个叫卢拉的孩子,后来成了巴西的总统。

摘自《青年文摘》

他的邻居,乳腺癌晚期,每天接受化疗,痛苦不堪,病者的家属因此趋于崩溃。李伟劝她爱人:“她特别需要心理关怀,送到我那里去吧。”4个月后她走了,嘴里带着微笑,这让李伟觉得释然。

至今中国已有临终关怀机构百余家,但与美国2000余家的数字相差甚远。

“每天拥抱死亡,我的生命质量很高。”李伟讴歌静谧,美好的离去。然而有如此豁达胸怀者,世间寥寥。关怀医院的发展遇到了无数困难,搬家就搬了7次。护工们曾被社区的群众堵在车里面,不让放下病人,因为那些人觉得每天社区都要“死人”,太晦气。也遇到很多好人,比如一位的哥帮到车上护士在哭,义愤填膺,义务帮着医院搬家,一遍又一遍,搬完就悄悄走了。

李伟说:“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好心司机的名字,但我在心里面会记他一辈子,这些人会记他一辈子。”

通过20多年对万名临终病人的调研总结,松堂关怀医院发现:人类的临终期并非约定俗成的6个月,而是10个月,约280天。一个生命在妈妈的子宫里被呵护,关怀,从而诞生;当他老了时,发白齿摇,就变成了“老小孩”同样需要呵护和关怀。

“他不能再回到妈妈的子宫里,他需要和谐的社会营造出社会的子宫。在这个‘子宫’里,在医护人员帮助下,他减轻了肉体上的痛苦;在心理医生的关怀下,他消除了恐惧和遗憾——在这样的氛围里,生命完成最后的成长。”接受鲁豫的采访时,李伟这样说。

叶芝有一首诗《当你老了》,“当你老了,头发白了,睡意昏沉,炉火旁打盹,请取下这部诗歌……”这般温柔的爱意,赠与父母,也给予终将白发的我们。

摘自《读者》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我的平民色彩

葛优

我一直到十八九岁都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是什么样。我爸演戏的时候,我经常躲在一边看。那时,我觉得自己可能是一辈子的忠实观众吧。

“文革”结束了,艺术学院招生,我忽然好像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。考艺术学院时,主考官让我演一个动作;从后面捂女孩的眼睛,我太紧张了,捂住她的眼睛,手就放不下来了。那女孩只好把情人见面的戏变成了抓流氓的戏。

我最大的特点是两个字,一是蔫,一是缩。我不像我爸,他脾气火爆,敢当着一千多人的面上台指挥。我打死也不敢。只要有台活动让我出席,我就本能地往后缩。如果出席的人有十几个,我就本能地坐在最边上。我要是紧张了,就容易出汗,手心脑门出汗。出席活动,快到大厅门口时,我最紧张,好像一开门就有机枪扫射似的。

老那么惯着自己,也不行。都老大不小了,有人叫老师了,还那么羞答答的,不行。我也假装放松过,就想象自己在拍戏,效果似乎也不错,可总觉得太假了。我告诉别人,其实我不紧张。有人说:“谁都能看出来,你满脑门子汗,说话磕磕绊绊,不叫紧张叫什么?”我索性老老实实说自己紧张,也不想老装个大尾巴狼。这么一想,我反倒踏实下来。

我从小在北影院长大,从小看过太多著名的演员,比如于洋、赵子岳、张平等。街坊邻居都是全国闻名的大演员,有时我刚看完他们主演的电影,回家就看见他们骑着自行车,筐里装着刚抢购回来的大白菜,好像刚从银幕上下来。

如果时光倒流,我愿意回到刚成名的那个阶段。李敖写了一本书叫《上山下乡》,我很喜欢这个书名。人生用这四个字就穷尽了。刚成名的时候是上山,上山时一切都是未知,你不知道自己会到什么地方,能到什么地方,你在上升的曲线上。人最美好的是追求的过程。你看世界上流传的最经典爱情故事,都是没有结局的,如罗密欧与朱丽叶、梁山伯与祝英台。什么是结果?死亡才是真正的结果。也许等我再老些,就能接受日本人的美学观了——下山也是一种美,但现在我觉得没走到头的时候是最好的。

人的一生都是偶然。演《霸王别姬》我没得奖,演完《活着》,天时地利人和都该我得了,就得了。如果当时有什么别的戏出彩,也就没我了。

20世纪90年代,人们不把那些

高大全的人物当回事了,都想看到活生生的人。我有平民色彩,不虚伪。那时,中国人开始需要大批量的幽默,不想进电影院受教育,上课。我代表那时人们的心态,比较放松,比较乐观,也比较普通。谁也别想教育谁,大家都是平等的。那时经济发达,过去很多牢笼式的观念被打破。大家忽然发现,不是只有那些长得好看的,说得好听的人才重要,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。连葛优都能上屏幕,谁不能呢?

比起一些偶像明星,我觉得特别坦然。我不怕年华老去,不用和狗仔队打游击,不用为了曝光率没事找事。我是一不想当老百姓的对立面,二是我也当不上,三是当上的代价太大,活着该有多累!

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一个人待着。有朋友一拿起书,看两行字就晕了,我不至于那样,每天至少要看十几个剧本吧。我觉得还不够惨,还不够让我拿起一本书就放不下,周围总有好多事干扰我。

我也爱热闹。比如喝点儿酒、聊聊,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。我是最不怕听人说的,只要对方能侃,我就可以一直听他说下去,所以朋友爱找我喝酒。我最爱扮演的角色就是观众。每次喝酒,我说话很少,更多是看朋友耍贫。

我总是矛盾着,又想热闹又想静,是不是有点儿矫情?

摘自《时尚先生》

年前,曾经给杨绛寄过稿费吗?那时正是我俩在英国最困难的日子,你可是帮了我们大忙呀。”

萧乾怔怔地想了半天,才记起当年的那件小事。他万万没想到,时隔半个世纪,这位大学者依然将它铭记在心。他不禁感慨地说:“原来如此!我对每个作者都是一视同仁,为他们服务只是我的本分而已呀!”

钱钟书坚持道:“只要是帮助他人的事,分内分外又有何差别?我还是应该感激呀!”

一段感激跨越了47年,始终没有冲淡消散,令人无比感动。萧乾再走到哪里,都乐于宣称钱钟书是自己的至交好友,因为他深知,一个人懂得将领受过的恩情牢记心间,哪怕再住问:“先生德高望重,与我也未曾有亏,为何总称我为恩人?”

摘自《环球人物》

青春在一个暑假里速成

朱迅

小时候,我们三姐妹之间的游戏是演戏。我总是当仁不让地扮英雄,大姐长得好看,演女特务。二姐大力气,演坏人最好。一天,刚看完《红色娘子军》,一进家门,只见二姐披着毛巾被威风凛凛地站在床头,“说!你把人藏到哪儿了?!”

“不知道!”我英勇不屈。“女特务”二话不说,挥枪射击,我应声倒地。一声闷响,我的头实实在在地撞上了墙角,顿时鲜血如注。桌上的小收音机也掉在地上,壮烈“牺牲”了。妈妈闻声进屋,见状吓得抱起我就往医院跑,缝针、包扎,忙了大半夜。回到家,妈妈把二姐狠狠地骂了一顿。我晕晕乎乎地躺在床上,觉得自己为艺术献身,特别“崇高”,心里没有丝毫懊悔之意。

刚上中学,爸爸就被派到香港长驻,妈妈随行。北京的家中只有姥姥照顾我们姐妹。

那一年我读高一,大姐读大三。暑假里的一天,大姐翻着报纸,突然冒出一句,“我想去应征方便面广告的模特。”我吓一跳,在上个世纪80年代,拍广告还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。我也算“触过电”的人,很权威地甩过去六个字:“算了,丢份儿。”二姐倒觉得很新鲜,“我陪

你去。”第二天,姐姐们躲在屋里细细打扮了一番,出门之前严肃警告我不许告诉姥姥。

几个小时后她们兴奋地回来,一看那样儿就知道已经得意忘形了。

姐姐并没考取某广告公司的代言人,可那次招聘的评委中有一位是电影《摇滚青年》的副导演李童,“她把我的地址和电话留下来了,说明天来家里取照片!”大姐是个文静的女孩,很少见她这么喜形于色。我真替她高兴,“这才够档次!”

第二天上午,我陪姥姥上街买菜,目的是把她巧妙地引开。配合得好极了,就在这个空当,那位李童真的来了。家里的照片几乎都是我们姐妹的合影,翻了半天,她中选中了一张我和大姐的合影。下午一辆奔驰200把大姐接走了,两个小时李童又把大姐送了回来。车没走,李童说导演看了我们的合影,让她也把我接过去看看。

奔驰停在香格里拉饭店对面的一栋家属楼前,这里已经停了八九辆各种各样的车。李童把我带上了一辆大巴,让我等着。车上已经有很多工作人员,有的在化妆,有的在整理道具,看来是个小姑娘,就好奇地问,“你是来干吗的?”

硬汉的温柔

阿遥

……”洪金宝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

此时,大家划着拳喝着酒,谈笑风生,酒桌上的气氛已完全步入佳境。洪金宝却突然站起身来,对正在兴头上的大家拱了拱手说:“抱歉,我有点事要先走一步,朋友们吃好喝好!”大家心里都很不解,搞不懂洪金宝为什么会如此扫兴,且看到他一副着急的样子,又不便强加挽留。

洪金宝走后,其他人继续喝酒。深夜返回时,大家惊讶地发现,洪金宝住处的灯居然还亮着。

第二天,洪金宝早早地来到拍

摄现场找到甄子丹,把一张武术指导图交到他手中。甄子丹一下子惊呆了,本应是右手出力的动作,都换成了左手。要知道,武术的动作是连贯性的,牵一发而动全身,几百个招式都得打乱重来。再望望面前两眼布满血丝的洪金宝,想到他昨晚的匆匆退场,深夜窗口不灭的灯光……甄子丹恍然大悟,为了避免自己的右臂二次伤害,洪金宝连夜为自己量身定做了一张武术指导图啊!一股暖流顿时涌上了心头。

在新片发布会上,甄子丹无比动容地说,自己拍摄《叶问》最大的收获并非片酬,而是得到了比片酬更珍贵的东西,这便是让他心生暖意的朋友的关爱之心。这颗心是洪金宝给他的,也将被他传递给更多的朋友。

摘自《意味》